

# 波尔多酒庄的伤心故事

曹景行

2015年7月的一天上午，法国波尔多地区天气阴沉沉的，还不时飘来几滴雨星。我们来到圣-克里斯多利小镇上，四周找不到一个人问路，这在法国、在西欧倒也是常事。总算发现一块小小的路牌，指明去圣多利酒庄的方向。小镇的名字和酒庄原文都是Saint-Christoly，只是酒庄的中文翻译成了圣多利，而且榜上有名。

酒庄位于波尔多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梅多克的中心，我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按照约定时间前去采访。小巷子转弯就看见墙上大字，表示着酒庄就在前面，女主人玛蒂娜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她同开动装货铲车离去的女儿讲了几句，就转过身接待我们。年过六十的她打扮像个老师，只是脸上带着阳光染的金黄色，踩在砂砾地上的双脚肤色更深，从五彩凉鞋前端露出的脚趾甲都涂得红红的。

酒庄不大，葡萄种植面积三十公顷，一半种梅洛，另一半种赤霞珠，建筑物也就几栋平房。我去过好多国家的酒庄，都有差不多的参观程序，主要介绍他们的葡萄品种、生产过程和产品特色。玛蒂娜却直接把我们带到酒庄，那儿也没有什么特别，一两百只装满葡萄酒的大木桶上下两层整齐排列堆放。吸引我们的是一面墙上的一张肖像画，还有用好多条白色细绳串联起来的家谱。

玛蒂娜要讲的正是圣多利酒庄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他们家族的历史。从1850年开始种植葡萄，酒庄至今已传到第七代经营者手中，就是玛蒂娜的两个女儿桑德琳和凯瑟琳。她们都已四十上下，一位主管生产，一位负责销售。她们的孩子已经出世，应该是酒庄的第八代主人。但在墙上族谱图表的中心位置，却是无缘成为酒庄继承者的约瑟夫·皮内，玛蒂娜丈夫赫维·荷劳德的祖母伊冯娜的兄长，肖像画中的这位年轻军官。他的名字下写着1891-1918的字样，去世时才27岁。

玛蒂娜指着面前成排的酒桶，我们看到上面贴着的五个年份：1914、1915、1916、1917、1918。那不是酒的年份，而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瑟夫从军出征的记录。他有一个习惯，部队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寄一张明信片回家报平安。今天，他的后人把这许多张明信片复制出来，一只大木桶上贴一张，展示出那几年里他的军旅路线。

大战开始那两年，约瑟夫主要在法国北部作战。1916年6月，他寄回家的明信片上打着凡尔登的字样。书记载，那一年年初打到年末的凡尔登战役，是一战中“破坏性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法德双方共投入两百多万兵力，死伤总数近一百万，两国各有十多万官兵葬身战地。约瑟夫还算幸运，这年9月他同部队调到法国西南部。

1917年3月，约瑟夫明信片上的地点开始向东方移动，4月从法国南部港口马赛上船，5月登陆意大利，接着到了罗马、那不勒斯，又继续往东直到希腊南部才停留下来。法国把军队调到希腊，是为了对付德国的盟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土耳其）。5月15日早上8点，约瑟夫在寄给妹妹伊冯娜的明信片中写道：“今天，我们即将在一小时后登陆。这里的海很美，天气很好。我想我们能顺利穿越。”

一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仍然待在希腊南部的约瑟夫在1918年1月19日的家信中说：“亲爱的伊冯娜：你能给我寄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吗，这里没有这些东西——这儿依旧很冷，真希望坏天气赶紧过去，不过我更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我们在这儿什么都不知道；德国鬼子和保加利亚人暂时还没有动静。我们希望一直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伊冯娜和她的父母也一定这样想。

又过了近半年，大战已近尾声，法国和她的协约国伙伴胜利在望了。

1918年6月，约瑟夫的部队北上到了贴近保加利亚的萨洛尼卡，希腊人称为塞萨洛尼基。今天是希腊第二大城市的萨洛尼卡，1917年8月被守驻的法军引发一场大火毁了大半，三分之一居民无家可归、四散离去。约瑟夫和他们部队到达时，应该还看得到灾后惨况。

10月的一天，也就是1918年11月11日一次大战各方签署停战协议前的两个星期，约瑟夫从萨洛尼卡寄回了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他没能回到波尔多的自己出生之地，给亲人送去的只是阵亡通知书和四年征战中得到的5枚勋章。在圣-克里斯多利小镇中心广场上，有一座白色的纪念碑，两侧刻着一次大战中阵亡的24位当地年轻人的名字，1918年有三位，最末那一行的名字就是约瑟夫·皮内。

约瑟夫已经去世近百年，他今天仍然是圣多利酒庄故事中的一位主角。只是因为他的不幸，酒庄的主人不再姓皮内，由妹妹伊冯娜与丈夫继续用心经营。他们努力提升红葡萄酒品质，1924年在巴黎农业大赛葡萄酒竞赛中获得第一块金牌，此后又多次获奖；1932年得到“中级酒庄”称号，德国鬼子和保加利亚人暂时还没有动静。最近几年里，2009和2010两年

玛蒂娜同丈夫赫维接手酒庄已近四十年，他们的女儿出外留学回来加入经营。同波尔多地区的大小酒庄主人一样，他们现在担心的是气候变暖，传统品种的葡萄质地和产量都受到影响，或许要试种一些其他品种。最近几年里，2009和2010两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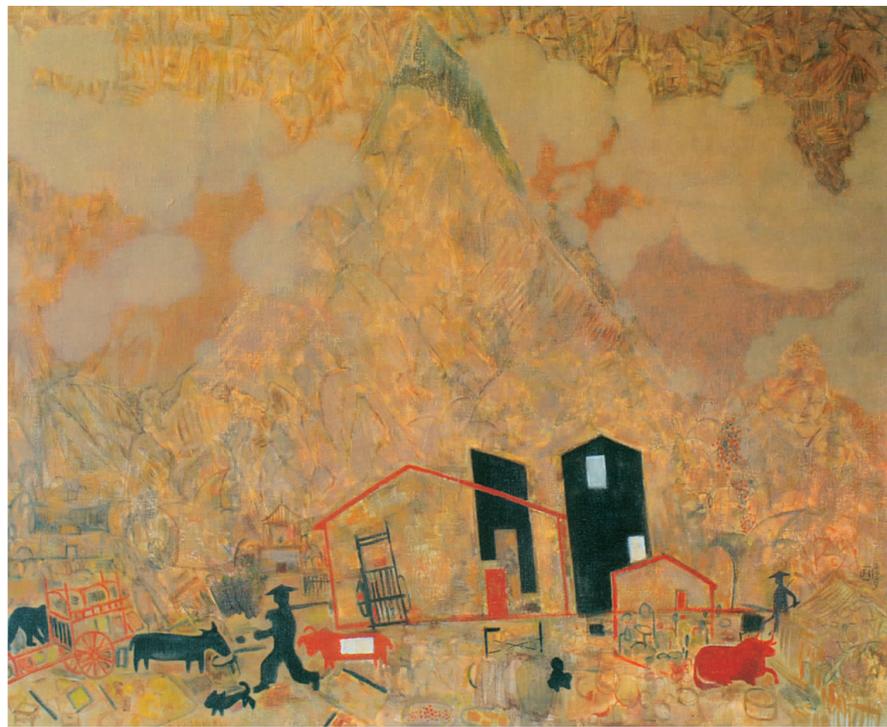


酒桶上贴着的，不是酒的年份，而是约瑟夫一战中从军出征的记录。曹景行摄

是他们葡萄酒的好年份，获奖的佳品每瓶才卖11欧元。

离开圣多利，口中还留着品尝红酒后的味道，想着的却是贴在酒桶上的约瑟夫明信片。同圣-克里斯多利一样，法国几乎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纪念一次大战为国捐躯者的名单，有的刻在教堂墙上，有的在市政厅门口，有的放在大学里面。

这次离开波尔多后途经波城，看到市政厅大门内两侧墙上都嵌着石碑，分别纪念一次大战同二次大战中当地的亡灵。一战那块面积大许多，刻上的名字也比另外一块多，而且全是军官兵。统计数字表明，一次大战法国军队伤亡人数高达全部人口的二十八分之一，比对手德国的三十二分之一、盟国英国的五十七分之一高出许多。像约瑟夫那样的年轻精英或成千上万倒在了战场，从此法国大伤元气、一蹶不振。二十年后大战再次爆发，法国迅速败退和投降，也就可以理解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油画）黄菁

## 笔会

“嗒嗒嗒”……听到这样的声音，抬头一看，哦，洒水车来了。安静的午后，街上并无行人，车缓缓开过，水洒在几乎一尘不染的街道上。

怎么？我听到的是另外一种声音？“嗒嗒嗒”……

我正去探望一位旧友，走在长乐路上。南面是儿时住过的弄堂，北面是延中绿地。

六十年前，上海的夏天，经常有洒水车开过。车子的喇叭，就是这样的声音。洒水车开在淮海路上，不过是一道风景而已，开在长乐路上，才真正成为儿童的快乐。

隔着一条长乐路，是两条石库门弄堂，和合坊和杨家弄，弄口对着弄口。夏天，最热的时候，孩子都在弄堂中，或者打牌，或者下棋，或者打康乐球。只要洒水车喇叭声一响起，立刻就有人放下手中的东西，跑到长乐路上。

大多数人只是站在马路边上，只有少数十多个人，跟着洒水车，在长乐路上飞驰。夏天，大多数孩子都是赤膊。他们脱下布鞋，或者是木拖鞋，顺手塞给同伴，赤脚最适合跟着洒水车。他们跑在下午炎热的阳光下，跑在发亮的水花之中，呼喊和欢笑。

洒水车司机还很年轻，那时候的洒水车，还很简陋，是卡车改装的。年轻的司机，依旧有顽童之心。他们知道长乐路上有孩子在洒水车后面奔跑，他们希望孩子尖叫，希望满街吵闹，也知道孩子早就浑身湿透。他们一面用力捏着喇叭，一面将水枪喷得最远，甚至令上街沿的包饭作、大排档的师傅，小书摊主和小皮匠都往后一躲。

## 跟着洒水车飞跑

胡廷楣

水柱绕过女孩，让她们漂亮裙子不着水星。

或许还有男孩，跟得慢了，追赶一阵，除了汗水，没有被浇到清水。他看着其他孩子湿淋淋贴在小屁股上的短裤，羡慕得要哭出来。

阿五头是从巨鹿路菜场买了一碗豆腐回家的，不由自主跟着洒水车跑。不料滑了一跤，那装了豆腐的碗，瞬间飞起，然后在水花之中翻身，合扑在地上。豆腐当然碎了，碗也碎了，不过碎得很干脆，两半。

“嗒嗒嗒”的声音远去，阿五头从地上捡起破碗回家。妈妈本来是要烧咸菜豆腐的，现在咸菜依旧，豆腐没了，便拦腰一巴掌。一条弄堂都听到了她的咆哮：“你当挣钞票那么容易，你去弄一张钞票试试！”

阿五头便泪水汪汪，坐在门口。捧着碎成两半的碗，手中捏着五分钱。那是阿五头每月零花钱的十分之二。

他倾听着弄堂的声音，“修洋伞，阿有坏套鞋修哇？”“削刀磨剪刀。”都不是，他等待那种怪模怪样的低沉声音，“喔，钉碗！”

补碗匠可以将他的碗修好。补碗又是一种表演艺术，一群孩子围成一圈，看着上了年纪的补碗匠，将粗大的手指在舌头上粘着唾液，涂抹在瓷碗上，然后用弓子转动“金刚钻”，小孩无论如何都看得过瘾。

铜钉补好的碗在弄堂中吃饭，这碗难免要被不怀好意的隔壁小孩研究一番，追问后来有没有吃到咸菜豆腐，以后是不是还去追赶洒水车。

不知什么时候，弄堂里出现了一种旋律。开头便是“嗒嗒嗒，嗒嗒嗒”……后来就有了“嗒嗒嗒嗒嗒嗒嗒”……

孩子并不知道这一曲子的作者是谁，就是喜欢。从一开始模仿洒水车的喇叭声，就感到亲近。男孩放学后回家便会在弄堂中毫无顾忌大声唱着。女孩也唱，一蹦一跳如同跳舞一样走过弄堂。这不是歌，是曲。石库门的流行音乐都是廉价的短笛吹出来的，有人起头，便有应和。有时四面八方，都有短笛呜呜的，在黄昏时候吃饭的时候，欢快地响起。音乐找到了快感，声音便轻轻地从世俗中浮起，浮动在空间，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

能够跟着洒水车奔跑的孩子不多，大部分已经上小学的孩子并没有这样的勇气，谁都在心中跃跃欲试，可是很多人都知道老师和父母必然不赞成，于是带着无限的羡慕站在街头。音乐却有这样的魔力，无论跟着或者不跟着洒水车奔跑的孩子，都可以用一两分钟的乐曲享受这样的快乐。

只有读了中学课本才知道，这是一首钢琴曲，名叫《嬉水》。写的便是跟着洒水车奔跑喧闹的孩子。是音乐家妙手偶得。

所谓艺术的空灵，经常在饱满的质感之上。《嬉水》无疑是时代质感的，那种孩子的快乐，只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大上海还不够大，魔都还不够魔的时代。

那时候没有今天那样多的汽车，连有自行车的家庭也不是很多。街上并不是如此洁净，每一条小路几乎都是通往菜场，街上会有豆浆，菜皮，有病家倒在马路正中的药渣。街道暴雨过后，积水会有阴沟泛出的黑泥。

洒水车为什么在夏天从早上跑到傍晚？那时候夏天的太阳，可以直接将柏油马路烤化，软软的，如同黑色的奶酪，可以将男孩女孩的布鞋和木拖鞋粘住。

孩子或者为什么以追赶洒水车为乐？皆因为石库门此时并不是小康的象征，大部分孩子家中并不富裕，奔跑的孩子穿着的家做短裤，屁股上往往有补丁。一家仅有一小方空间，女孩的布娃娃已经玩腻，男孩的长枪大刀，香烟牌子，也都被手指弄得黑乎乎的。孩子在夏天，除了打牌下棋，或者疯跑，别无去处。

如今井然有序的街道，纵横交错的白线和黄线之间，洒水车庄严地缓缓地清扫街道……驾驶员也未必有顽童之心，如果没有孩子跟着洒水车飞跑，那么音乐家有再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再写一曲有着现代意义的《嬉水》……

在一次大型少年儿童的钢琴比赛中，我曾经问过一些评委老师，是不是有人弹奏《嬉水》？他们回答说，没有。《嬉水》过于简单了一些。

我相信这是对的，既然是比赛，那么一定会挑选难度高的作品。况且，那些将红色封面巴赫练习谱拿在手里的孩子，他们的向往和情感，与跟着洒水车跑的孩子完全异趣……

#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

吴晓东

外国知名作家访华一向造成文坛热点。从毛姆、罗素、杜威，到泰戈尔、巴比塞、伐扬·古久列，再到抗战时期的海明威、奥登、伊舍伍德，都给中国文坛留下不大不小的冲击。但是恐怕上述作家谁也没有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的闪电访沪带给沪上文坛如此大的冲击波。鲁迅即称：“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不必说毕力涅克和穆杭了。”

上海新闻界在1933年初即传出77岁高龄的萧伯纳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的共同邀请下，将乘不列颠皇后号到上海作短暂访问的消息。萧伯纳尚未到沪，各大媒体已掀起“萧伯纳热”。2月2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郁达夫的《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我们正预备着热烈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的萧老。”2月9日，又发表玄（茅盾）的文章《萧伯纳来游中国》；2月15日起连载袁阔（汪佩然）翻译的萧伯纳的小说《黑女求神记》。而在萧伯纳抵沪的当天和次日，《申报·自由谈》还连续两天刊出“萧伯纳专号”，其中有阿何干（鲁迅）的《萧伯纳颂》、郁达夫的《介绍萧伯纳》、林语堂的《谈萧伯纳》、玄（茅盾）的《关于萧伯纳》、郑伯奇的《欢迎萧伯纳来听炮声》、许杰的《绅士阶级的蜜蜂》和杨幸之的《Hello Shaw》等等。

此后，《论语》1933年3月第12期出了“萧伯纳访华专号”，刊登了蔡元培、鲁迅、宋春舫、邵洵美、洪深和主编林语堂本人对萧伯纳访沪的观感，《现代》杂志在萧伯纳访沪的前前后后也做足了文章。据施蛰存在《〈现代〉杂忆》一文中回忆：

萧伯纳到上海，我虽然没有参加欢迎，《现代》杂志却可以说是尽了“迎送如仪”的礼貌。二月份的《现代》发表了萧的一个剧本，四月份的《现代》发表了萧在上海的六张照片，当时想有一篇文章来做结束，可是找不到适当的文章。幸而鲁迅寄来了一篇《看萧和“看萧的人们”》，是一篇最好的结束文章，可惜文章迟了，无法在四月份和照片同时发表，于是只得发表在五月份的《现代》。同期还发表了适夷的《萧和巴比塞》，这是送走了萧伯纳，准备欢迎巴比塞了。萧参选在莫斯科，得知上海正在闹萧热，译了一篇苏联戏剧理论家列维茨夫的《伯纳萧的戏剧》，介绍苏联方面对萧的评价。这篇译稿来得更迟，在十月份的《现代》上才刊出，它仿佛也是鲁迅转交的。

萧伯纳的这次半日访沪还顺便给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增添了一个砝码。由瞿秋白与鲁迅一起“闪电”编辑，鲁迅作序言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个月左右即“闪电”推出，毛边道林纸，封面由鲁迅本人亲自设计，图案为剪贴各报记载，白底红色，按照唐弢在《野草书屋》一文中的形容，恰如画家所作“倒翻字纸篓”一样。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付给瞿秋白，此书也构成了鲁迅和瞿秋白深厚友谊的一个历史性见证。

《萧伯纳在上海》1933年3月由上海野草书店出版，封面上的作者栏写得繁复而有趣：“乐雯剪贴翻译并编辑，鲁迅序。”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但具体做“剪贴翻译并编辑”工作的，其实是瞿秋白。唐弢曾回顾说：“当时瞿秋白住在上海，个人生活奇穷，鲁迅劝其编集此书，一来可以换点钱，二来亦可以保存各方面因萧的到来而自曝其本来面目的事实。”全书共五部分，第一为“Welcome”，分“不顾生命”及“只求幽默”两节，收的是诸家或欢迎或痛骂的文章；第二为“诤萧的国际联合战线”，收上海各外报的社评；第三为“政治的凹凸镜”，收同题文章一篇，附录日文报上的记载两种；第四为“萧伯纳的真话”，收萧伯纳在香港、上海、北平三地所做的片段谈话；第五为“萧伯纳及其批评”，收黄清作《萧伯纳》及德国特甫格作《萧伯纳是五角》两篇。总括五部分的是编者的《写在前面》。全书卷首还有鲁迅写的《序言》。

鲁迅的序言以及该书的《写在前面》（应该是瞿秋白执笔）都是大落可一书的佳构。从《写在前面》的末尾落款的时间（2月22日）上看，鲁迅和瞿秋白在几天内就“剪刀加浆糊”地编好了这本“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鲁迅对这部《萧伯纳在上海》堪称重视，除了为该书写序，亲自设计封面之外，还亲自写广告语，刊登在1934年4月上海联华书局发行，瞿秋白翻译的《解放了的董吉阿德》书末：

萧伯纳一到香港，就给了中国一个冲击，到上海后，可更甚了，定期出版物上几乎都有记载或批评，称赞的也有，嘲骂的也有。编者使用了剪刀和笔墨，将这些都要汇集起来，又一一加以解剖和比较，说明了萧一方面平面的镜子，而一向在凹凸镜里见得平正的脸相的人物，这回却露出了他们的歪脸来，是一部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编者：是乐雯，鲁迅作序。

广告中称该书“是一部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把萧伯纳比喻成“平面的镜子”，使“一向在凹凸镜里见得平正的脸相的人物，这回却露出了他们的歪脸来”，“未曾有过先例”指的正是萧伯纳访华润见出中国文人的真实嘴脸。可见鲁迅和瞿秋白编辑此书所真正关注的，也许并非萧伯纳本人，而是中国文坛借萧伯纳访华事件而折射出来的众生相。与其他知名作家来访的差异或许在于，萧伯纳的闪电访沪正使华界众生相得以凸显。因此，编了一本书，鲁迅仍意犹未尽，在2月23日所写《看萧

和“看萧的人们”记》一篇中，鲁迅仍在继续萧伯纳“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的话题。也正如鲁迅在《萧伯纳在上海》的序言中所说：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鲁迅讽刺的这些“样貌”，在施蛰存多年后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过了几天，李尊庸送来了七八张照片，我在二卷六期的《现代》上选到了六张，其中有一张是《现代》所独有的，可惜现在我已记不起是哪一张了。有一个上海文人张若谷，一贯喜欢自我宣传，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不知以什么记者的名义，居然能混进宋宅和世界社，每逢摄影记者举起照相机的时候，他总去站在前头。萧伯纳在世界社靠墙壁坐着，让记者摄影，张若谷竟蹲到萧伯纳背后，紧贴着墙壁。记者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也照了进去。洗印出来的照片是：他的整个身子都被萧伯纳遮住了，只从萧伯纳肩膀底下露出了一个头面。这张照片使我很厌恶，但是我当时还不懂得照片可以涂改，就只好照样给印出来。

正因当初没有今天司空见惯的图像处理技术，《现代》才得以以为后来的读者给鲁迅讽刺过的“样貌”立此存照。《萧伯纳在上海》的《序言》由于是鲁迅所作，更为人熟知。而可能主要是瞿秋白执笔的《写在前面》则值得多介绍几句。《写在前面》的副标题为“他非西洋唐伯虎”，文中侧重讨论的是萧伯纳的“幽默”这一话题：

萧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多功夫。但是，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仿佛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他说真话，一定要传成笑话。他正正经经的回答你的问题，却又说他“只会讽刺而已”。中国的低能儿们连笑话都不会自己说，定要装点唐伯虎徐文长之类的名人身上。而萧的不幸，就是几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这么一个“戏台上的老头儿”。

可是，又舍不得他这个“老头儿”，偏偏还要借重他。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原本是大家都把他做凹凸镜，在他之中，看一看自己的“伟大”而粗狂，歪曲而圆转的影子；而事实上，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镜，把萧的影子，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拗捏得像一副脸谱似的：村的俏的样样俱备。

然而萧的伟大并没有受着损失，倒是那些人自己现了原形。文章堪称痛快淋漓，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所撰广告与这篇《写在前面》的内容多有重合，想必也可以看成是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两位知己共同的天作吧？

文章堪称痛快淋漓，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所撰广告与这篇《写在前面》的内容多有重合，想必也可以看成是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两位知己共同的天作吧？

文章堪称痛快淋漓，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所撰广告与这篇《写在前面》的内容多有重合，想必也可以看成是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两位知己共同的天作吧？

文章堪称痛快淋漓，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所撰广告与这篇《写在前面》的内容多有重合，想必也可以看成是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两位知己共同的天作吧？

文章堪称痛快淋漓，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所撰广告与这篇《写在前面》的内容多有重合，想必也可以看成是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两位知己共同的天作吧？

文章堪称痛快淋漓，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所撰广告与这篇《写在前面》的内容多有重合，想必也可以看成是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两位知己共同的天作吧？



「文汇报」微信二维码